

英国脱欧，欧盟与亚洲：欧洲自由主义的终结？

[英] 拉蒙·帕切科·帕多

内容提要：受全球化和一体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下降、就业竞争、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影响，英国最终选择退出欧盟。这使得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需要承受一个在国际关系上更少自由主义、而更加现实主义的欧洲。英国脱欧使得欧盟一贯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纲领难以维持，欧盟未来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上的积极性会大幅下降；对于亚洲来说，英国脱欧首先意味着欧盟同若干亚洲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会有更大的变数。但政治关系上，自由主义的下降，会减少欧盟对亚洲的政策的规范性色彩。经济摩擦可能性上升的同时，欧亚之间在政治与外交上将会实现更多合作。

关键词：英国脱欧 欧盟 自由主义

桑德兰位于英国东北部，拥有27.5万人口，占英国总人口的不到0.01%。当地劳动力主要受雇于日产公司的一家制造厂，而在它生产的汽车中，55%都销往欧盟的其他国家。2016年6月23日晚，这个之前不太出名的城市登上了全世界的新闻头条。投票结果显示，61%的当地民众决定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脱欧博弈告终，英镑在结果宣布后立即贬值3%，而希望能够留在欧盟内的英国人则意识到，他们输掉了这次公投。脱欧会带来现实的风险，例如日产的制造厂可能不得不削减数千工作岗位，甚至将面临停产，但这并没有能够说服当地民众选择留在欧盟。相比留在欧盟这个世界最大市场内能够得到的明确且直接的获益，投票人对英国独自发展的不确定性有着更强的偏好。

拉蒙·帕切科·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博士 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伦敦亚太社会科学中心主任。

为什么52%的英国投票者做出同多数桑德兰人一样的选择，决定脱离欧盟？毕竟极少有国家比英国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益更多。在1973年加入欧盟时，英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事实也确实如此，1976年英国甚至卑躬屈膝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紧急援助。40年后，英国已经成为表现最好的发达经济体之一，它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数十万移民；伦敦是少数几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之一；英国的金融与商业服务、创意与时尚产业、高等教育等都是世界领先的。截至2017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存，我们仍可借用1957年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所发表的著名演讲中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英国的很多方面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然而，英国总体上的成功掩盖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英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之一。¹在伦敦的上流住宅中生活的成功且富有的金融家和律师们，与英格兰北部因工作外包而下岗的工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英国也是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发达国家之一。²在英国，人们所接收的教育决定了生活前景，这个问题几乎比西方任何国家都要严重。仇外心理与种族主义仍然以反移民的情绪在英国的大片地区表现出来。针对支持脱欧民众的调查与研究显示，对所谓的大规模移民的不满，即便不是多数民众投票脱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关键原因之一。³总之，自由主义没能让许多英国人产生获得感。资金与货物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失业。欧盟确保的人员自由往来也带来了移民，这被认为引起了不公平的就业竞争。如果民众认为欧盟同时象征着自由主义、全球化、移民以及民众面临的经济低迷，那么他们选择脱离欧盟也是合乎逻辑的。

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于英国脱欧这一问题上。矛盾的是，英国政府一直坚定支持欧洲的商品、服务、资金与人员往来。加入欧盟后，英国不断寻求经济的自由化、减少管制及自由贸易的发展。⁴在脱欧公投之前，很少有欧盟成员国像英国一样，对第三国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持如此开放的态度。与法国所领导的国家中心主义相比，英国确实是自由主义阵营非官方的领导者。然而，脱欧的投票显示，对自由主义的乐观态度在英国内部并不被广泛接受。与之相似，遍布欧洲的其他民粹主义政党或社会运动亦寻求从欧盟的自由化政策中退出。他们想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来塑造经济与社会。

结果，整个世界，尤其是亚洲，需要承受一个在国际关系上更少自由、更加现实的欧盟。欧洲的政治与商业精英开始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义在欧洲远

1 OECD, *Income Inequality (indicator)*, doi: 10.1787/459aa7f1-en, accessed on February 23, 2017.

2 OECD, *In It Together: Why Less Inequality Benefits All*,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3 Matthew J. Goodwin and Oliver Heath, “The 2016 Referendum, Brexit and the Left Behind: An Aggregate-level Analysis of the Result,” Vol.87, No.3, July-September 2016, pp. 323-332; Peter Walker, “Poorer Voters’ Worries on Immigration Fuelled Brexit Vote, Study Find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016.

4 Alex Barker, “If Britain Goes: Brexit Would Jolt the EU’s Political Order,”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15.

未被普遍接受。为了避免脱欧的再次发生，或者甚至是为了维持政权，欧盟成员国不得不考虑自身民众的愿望所在。这意味着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更深层次的合作，以及签证要求的放宽，都将不再是可供选择的政策。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以及更加强硬、更少普世主义（universalistic）的外交政策，将主导未来几年欧盟与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关系。

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以及更加强硬、更少普世主义的外交政策，将主导欧盟未来几年的对外关系。

英国脱欧与欧盟：自由主义在衰退？

欧盟既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又是其热情的推动者。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大国决定创造一个共同市场来促进和平，这背后的基本理念是，经济相互交织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在欧盟庆祝其推动自由贸易与和平60周年时，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欧盟通过深层的经济一体化，令人欣喜地成功避免了战争。这个成功使得欧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其模式。欧盟坚信自由市场、民主、法治、保护人权等自由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交织的，并且对所有个体都是有利的。¹ 因此，欧盟有责任在其内外部推广自由主义。

英国既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诞生地之一，又是其典范代表。至少从撒切尔夫人起，英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进欧洲层面的自由主义与一体化。² 撒切尔夫人本人就是1992年建立共同市场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很大程度上，托尼·布莱尔首相通过强烈支持欧盟向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扩张这一方式，来提升欧洲整体上从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所获得的收益。戴维·卡梅伦首相也强烈支持与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作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一的英国，致力于促进自由主义的放任经济（*laissez-faire economy*）。³

如果从外部来观察欧盟，这些自由主义的价值似乎是被广泛接受的，然而这并非事实。2005年，法国与荷兰的公投否决了旨在创造欧盟宪法的计划。大多数欧盟原有成员国就人员自由流动问题，向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强制实施了为期七年的过渡期政策。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让许多欧洲人开始公开质疑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全球化。尽管这么说可能存在过于

¹ Ben Rosamond, “Three Ways of Speaking Europe to the World: Markets, Peace, Cosmopolitan Duty and the EU’s Normative Pow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February 2014, pp. 133-148.

² Patrick Diamond and Roger Liddle, “Options for Britain: Europ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79, No.S1, September 2008, pp. 165-182.

³ 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简化的风险，英国脱欧无非进一步证明了，很多欧洲人严重担忧欧盟的自由主义与发展方向。英国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局外人。¹ 欧盟可能在外部推广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是其内部很多公民都拒绝、甚至恐惧这些价值观。

在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对自由主义的公开质疑达到了极点，并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产生了影响。从政治层面来看，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受到了鼓舞。其中很多政党已经存在了至少20年。然而，这些政党仅仅是在21世纪初才开始得到较为固定的选民支持，并能挑战传统政党。² 在全球与欧元区危机之后，随着中东欧国家的移民被部分西方媒体描述为对就业市场与生活水平的威胁，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重新出现，以及大量难民经过北非涌入欧洲大陆，这些政党已经成为主流的政治力量。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欧尔班·维克多领导的匈牙利公民联盟，以及基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的荷兰自由党，这些政党都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认为更自由主义、更一体化的联邦式欧盟即将出现，并且排斥这种倾向。它们向往更加简单、美好的过去，认为那时候经济安全与社会同质化仍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所料，主流的政党在对待移民和难民时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言辞与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最初欢迎叙利亚难民，但当德国舆论开始质疑这项政策时，她开始明确表示有犯罪记录的难民将立即被驱逐出境。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拒绝接收在欧盟成员国内分配难民的协定，宣称穆斯林将会使基督教的匈牙利彻底陷入混乱。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筑起了围墙，以阻止欧盟外的移民与难民进入其领土。在英国脱欧中呈现出的清晰的反移民信号在欧盟内反复重现。³ 作为自由主义与欧盟信条之一的“人员自由往来”，被当今很多欧洲民众深恶痛绝。欧洲呈现出现代化的堡垒模样，人们在堡垒内可以自由往来，但是从外部进入愈加困难。⁴ 这与目前的政治举措和多数欧洲民众的愿望相匹配。

英国脱欧带来的经济层面的影响，开启了对欧盟四项核心自由价值的辩论：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的自由往来不再是不被怀疑的政策；作为二战后欧洲主要成就之一的共同市场也面临威胁，即便英国多数民众也希望能够留在其中。⁵ 但是目前欧盟坚定的支持者也认为可能必须采取一些改革，来支持全球化与一体

1 Sarah B. Hobolt, “The Brexit Vote: A Divided Nation, A Divided Continent,”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3, No.9 (2016), pp. 1259-1277.

2 Treib, op. cit.

3 Andrea Bohman and Mikael Hjerm, “In the Wake of Radical Right Electoral Success: A Cross-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of Anti-immigration Attitudes Over Tim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42, No.11 (2016), pp. 1729-1747.

4 Claudia Finotelli,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 Fortress: European Visa Policies and the Limit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4, No.1 (2013), pp. 80-101.

5 John Curtice, “What Do Voters Want from Brexit?” November 16, 2016, <http://whatukthinks.org/eu/wp-content/uploads/2016/11/Analysis-paper-9-What-do-voters-want-from-Brexit.pdf>.

化中的“输家”。并且，欧盟“更紧密的联盟”的口号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欧洲国家发展速度不同，欧盟内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的经济融合速度更快，对这个现象带来的好处的讨论更加普遍。¹ 欧元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理论上，除了丹麦和英国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应该使用欧元，但实际上由于一些国家没有加入欧元区，欧元被接纳的进程放缓。

同时，考虑到民族与民粹主义在大量选民中占据主导地位，主流的政党不得不做出反应。² 为了回应选民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欧盟成员国的政治家们谴责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导致了全球与欧元区的危机。尽管进展缓慢，仍有多达十个国家正在讨论引入金融交易税，以控制投机性的资金流动。³ 此外，保护国内产业的承诺正在成为普遍现象。标致雪铁龙集团可能收购德国欧宝和英国沃克斯豪尔两家汽车公司，这促使德国与英国政府要求标致雪铁龙做出不会关闭任何一家工厂的保证。这显示了类似于其他地区的政治家，欧洲政治家也无法承受自由主义实践所带来的问题。

英国过去一直热衷于维护欧盟内部以及欧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自由主义。当英国开启脱欧进程时，我们能从欧盟内部看到一个加速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对贸易与投资协定缺乏热情，甚至充满争议。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谈判进展缓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欧盟的很多集团从一开始就反对TTIP，农民们担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社会活动家们担心美国式的私有化医疗，隐私拥护者担心对人们网上活动的监视，这些力量都是迫使欧盟显著放缓协议的谈判进程。在本文写作的时候，TTIP可被认定无法成为现实。⁴ 即便谈判重启，对协议强烈的反对声音也不会消失。其他潜在的，或者已经实现的协定也正在被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认为（并且自视为）贸易超级强权的欧盟，现在也开始谨慎对待自由贸易与投资。

长久以来被认为（并且自视为）贸易超级强权的欧盟，现在也开始谨慎对待自由贸易与投资。

英国脱欧后的欧洲与亚洲：向现实主义的关系发展？

随着英国脱欧前后自由主义在欧洲展现出衰退，欧盟与中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改变。亚洲国家不应再期待欧盟将继续支持自由贸易与投资、相对宽松的签证制度以及不受限制的开放政策。这些政策目前在欧洲无法得到选民支持，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问题仍将持续。没有一个竞选领导人的欧洲政治家能够

1 Tony Barber, “Moving to a Multi-speed Europ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17.

2 Bohman and Hjerm, op. cit.

3 Cecile Barbiere, “FTT Blockage Illustrates Pitfalls of Multi-speed Europe,” *Euractiv*, March 2017.

4 Shawn Donnan, “Trump’s Top Trade Adviser Accuses Germany of Currency Exploitati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017.

公开支持贸易投资与人员的自由往来。商业界也面临类似情况，如果不想承受民众的激烈反应，他们也不敢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很多欧洲人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向亚洲的外包，是欧洲就业与生活水平下降的关键原因。¹

可以说，对自由主义的激烈反对能够在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得到最明确的体现。作为2006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盟曾发布一项计划，旨在促进与地区内重要伙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² 布莱尔和卡梅伦也强烈支持这项较为成功的战略。2017年年初，欧盟与韩国之间的自贸协定已准备开始执行。欧盟与新加坡和越南签署了合作协定，而且大幅加速了与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谈判进程。考虑到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些协定与谈判不出意外将非常有利于欧盟。例如，在欧盟与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欧盟对其贸易逆差将转变为顺差。³ 原本在首尔街道上罕见的德国汽车、意大利时装和英国金融公司，未来将不断增加。当然，因为更加容易进入欧洲市场，韩国的汽车与电视制造商也能获益，不过欧洲的企业将获益更多。

尽管自由贸易给欧盟的企业与消费者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欧盟在与亚洲的贸易上仍将逐步抛弃自由主义，而倾向于现实主义。这意味着欧盟希望能够在贸易协定中得到更加清晰与即时的利益，并且减少对另一方的让步。欧盟甚至不惮在协议签订之后还提出更多的要求。再以欧盟—韩国自贸协定为例，尽管欧盟委员会公开承认协定对自己非常有利，认为协议生效后五年内欧盟对韩国出口将增长55%，但是欧盟现在已经准备提出修订了。在这些修订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希望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在亚洲物流枢纽出口的欧洲产品。⁴ 这将意味着欧洲的公司可以在亚洲成本低的地方进行生产，并在双边自贸协定的条款下将产品销往韩国，从而使得这些公司能够减少人力与运输成本。换句话说，欧洲的公司 will 得到明显的优惠，并且欧盟不必为此向韩国做出回报，因为三星、现代、LG 等韩国公司已经在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家设立了工厂。

由于英国脱欧，欧盟与新加坡、越南的自贸协定的生效也被延迟。在与新加坡的协定上，欧洲法院必须做出裁决：该协定是得到欧盟机构的同意即可，还是必须同时得到成员国的批准。没有英国的参与，欧洲议会可能更加倾向于贸易保

1 The Economist, “China Has Gained Hugely from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st*, December 2016.

2 Francesco Pontiroli Gobbi, “Improving EU-Asia Trade Relations,” November 7, 2012, [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bibliotheca/briefing/2012/120325/LDM_BRI\(2012\)120325_REV1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bibliotheca/briefing/2012/120325/LDM_BRI(2012)120325_REV1_EN.pdf).

3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South Korea,” February 16, 2017,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48.pdf.

4 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Boosted by Five Years of EU-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July 1, 2016,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6-2356_en.htm.

护主义，一些成员国将更不愿意支持这项协定。¹ 在与越南的协定上，欧洲议会已经指责欧盟委员会未能妥善地审查据称在越南存在的侵犯人权问题。² 这意味着这项协定在得到欧洲议会批准上将面临很大困难。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与官员届时将不会敦促欧洲议会批准该协定。

其他寻求与欧盟达成重要投资协定的国家也可以预期到一场艰难的谈判，尽管这些协定并不是那么雄心勃勃。随着《里斯本条约》在2009年生效，建立双边投资协定成为欧盟委员会的职责。目前，欧盟成员国拥有超过1200个双边投资协定，欧盟委员会的目标是以欧盟框架下的协定取而代之。作为欧盟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与目的地之一，英国过去不断敦促欧盟委员会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进程。然而随着2016年的结束，欧盟本身还没有签订一个双边投资协定。英国脱欧之后，随着欧洲的保护主义愈加普遍，与亚洲国家的任何一个双边投资协定都将更有利于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欧盟与中国之间就投资协定进行的谈判就是一个代表。中国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欧洲最先寻求协商双边投资协定的伙伴，但是谈判一直到2014年还没有显著进展。欧盟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欧盟希望建立起“公平竞争的环境”(a level-playing field)，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按照欧盟对待中国的标准，向欧洲的投资者进行开放，放松对投资的管制。³ 这个立场看起来可能符合逻辑且令人满意，但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由于欧盟本身对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更加开放，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在签证规定、投资者保护或者投资国争端解决机制上做出改革。

若习近平领导的政府愿意实行各种改革，达成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会非常有可能。但如果不是这样，为达成与欧盟的协定，中国政府将被迫引入自己不愿意进行的改革。而如果欧盟在中国不能满足条件时放弃协定，其他经济规模更小的亚洲国家将更难与欧盟签署投资协定，除非欧盟愿意做出重要妥协。

事实上，欧盟及其成员国已经开始对来自亚洲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它们毫不犹豫地对可疑的，或者是与其利益相悖的潜在投资采取了审查或者限制。欧盟委员会最近对一个连接贝尔格莱德与布达佩斯的高铁项目展开了调查。这个项目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由包括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组成的合资公司来进行建设。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个项目可能违反

1 Tang See Kit, “Brexit and the EU-Singapore FTA: Further Delays or a Slow-Death?” *Channel NewsAsia*, July 2016.

2 Martin Russell, *Brief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Progress, 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PE589.835, October 2016.

3 Rolf J. Langhammer, “Now Is the Time to Get Serious about EU-China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November 23, 2016, <https://blog.merics.org/en/blog-post/2016/11/23/now-is-the-time-to-get-serious-about-eu-china-trade-and-investment-relations/>.

了欧盟的采购法规。¹ 无论欧盟的这项调查有怎样的理由，不可否认的是，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相比，欧盟对来自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投资更加不欢迎。在对待中国时，投资常常被描述为政府主导的决定，目的是影响欧盟成员国的政策。

尽管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在处理与亚洲的经济关系时会更加倾向现实主义而背离自由主义，不过亚洲国家仍然有一个方法来使欧盟更愿意就协定与条约进行谈判，那就是用英国来牵制欧盟。亚洲国家可以利用与英国建立自贸区的前景，来迫使欧盟做出让步，比以往更快地签署协定。例如，由于英国公投脱欧，停滞不前的欧盟—日本自贸协定谈判已经重启。² 同时，亚洲公司可能将他们的活动从英国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英国原本是许多亚洲公司进入欧盟市场的门户，由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明确表示英国将离开单一市场，亚洲企业将不得不搬迁，以继续留在欧盟内部。这可以被亚洲政府用作谈判筹码，以便在任何贸易或投资协定谈判中从欧盟获得更有利的条件。

此外，随着英国离开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及其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的其他成员），英国将不得不与世界其他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考虑到特蕾莎·梅以及未来的英国政府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必要签订更多自由贸易协定，亚洲国家将发现更容易从英国获得让步。脱欧之后的英国由于经济体量较小，且在进入共同市场时会受阻，其作为投资与贸易伙伴的吸引力在降低。但是很多支持脱欧的群体承诺英国将会更加开放。亚洲国家的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承诺，利用被削弱的英国，在更加强大的欧盟面前获得更有利的交易。

英国脱欧与欧盟—亚洲政治关系：规范性削弱的欧洲？

随着英国脱离欧盟，欧盟与亚洲的政治关系也面临改变。在欧盟的政界和学界中，一场关于欧盟外交政策本质的辩论愈演愈烈。其中一方认为，欧盟是一个规范性政治力量的代表。这意味着欧盟的外交政策是由道德价值观和公共利益所驱动的，并且是在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原则，如法治、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等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辩论的另一方认为欧盟并不特殊：概括来说，他们认为欧盟与其他的国际行为体一样，认定自己的利益优先，并利用一切可使用的工具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欧盟的外交政策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欧盟的外交政策与大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样，既包含规范性的因素，也包含非规范性的因素。但是，欧盟对自身和其外交政策的认识，却可能决定它对亚洲政策的方向。

随着英国脱欧在即，欧盟对于亚洲的政策可能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首先，

1 James Kynge, Arthur Beesley and Andrew Byrne, “EU Sets Collision Course with China over ‘Silk Road’ Rail Project,”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017.

2 Alberto Mucci, “Brexit Revives Stalled Japan-EU Trade Deal,” *Politico Europe*, December 2016.

许多欧盟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都把欧盟当作是别的地区可以参照的区域一体化的典范。以亚洲为例，1994年欧盟首次出台的对于亚洲的战略，以及之后的各项文件都表明，欧盟认为自己是东盟应当效仿的地区一体化模板。欧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东南亚一直存在争议，不过英国脱欧终止了欧盟作为东盟模范的设想。如果一个由具有相似的政治体系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构成的区域组织，仍然无法留住它最重要的成员国，那么这个组织就不该成为被仿照的模式。

事实上，欧盟也已经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东盟发展成为东南亚的欧盟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多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盟对于东盟的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主要基于提供东盟需要的建议以及技术性指导，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就体现了这一趋势。东盟经济共同体效仿了欧洲统一市场的模式，并且也采用了欧盟内部的四大基本流通政策，包括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但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和欧洲统一市场存在很大不同。最明显的是，东盟的共同市场没有形成一个解决内部争端的平台，人员的自由流通也限制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岗位上，而且东盟也没有有力的措施来建立统一的政治和货币联盟。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盟促使东盟效仿欧盟的热情也大为削减。

这一事实反映出，欧盟对于其自身与东盟存在的不同更加尊重。欧盟的亚洲政策可能发生改变的第二个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点。简单来说，欧盟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不会像之前那样坚持对于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的推崇。其实，英国也不是一直都极力捍卫这些原则。英国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为了追求自由贸易，宁愿舍弃这些原则。欧盟自身也在逐渐向现实主义的贸易政策转变，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并且由于要应对英国脱欧，欧盟在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时坚持这些原则的软实力和精力都在降低。无论怎样，亚洲国家这次也不太可能会接纳欧盟的说教。更重要的是，欧盟内部的许多人认为，欧盟向其他国家推广民主和人权是不被欢迎的，因为这样做分散了欧盟处理更为紧急的内部问题的精力。

这种改变的影响之一将表现为，欧盟将根据亚洲国家本来的情况与其进行交往，而非依照欧洲对亚洲国家的期待。为了减少英国脱欧公投对其影响力的冲击，欧盟需要增强自身的外交力量。如果欧盟卷入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它的外交目标将很难实现。欧盟不太可能犯下这一错误，尽管一些欧盟国家，如丹麦和荷兰，以及一些欧盟机构，如欧盟议会等，更希望价值观能够成为欧盟亚洲政策的主导因素之一。欧盟内部关于对缅甸政策的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2014年启动的双边人权对话，就是对一些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让步，他们担心欧盟在恢复与缅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上走得过快，尽管原本由军政府控制的缅甸已经开始改革。但是这一对话并未减缓欧洲公司和缅甸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就像欧盟和其他东盟国家建立的人权对话一样，这些由精英支持的对话更主要是为了平息欧盟成员国的情绪，而不是欧盟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重点。

英国脱欧最终促进了欧盟针对亚洲规范性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自2005年前后就开始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里斯本条约》生效之后，一些熟悉亚洲事务的欧洲人开始在不同的欧盟机构中任职。欧盟对外行动服务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就聘用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亚洲国家历史、文化及现实情况的官员，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也是如此。一些欧盟成员国，如法国、德国和波兰等，都拥有许多非常了解亚洲事务的外交人员和专家。这些专家的真才实学催生了更加现实主义，而非价值观驱使的外交政策。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这个转变会更加明显。

改变后的欧洲与欧盟—亚洲关系

英国脱欧公投带动了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倒退，事实上，这种倒退也是脱欧公投产生的原因。欧洲有许多像桑德兰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和地区一直没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去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而去工业化进程主要源于全球化、私有化，以及其他影响到欧洲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潮。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唤醒了许多欧洲群体的不满情绪。很多欧洲人在危机中失去了他们的工厂或者工作，但是并没有获得帮助，他们开始公开质疑欧盟的经济制度，因为需要对两次金融危机负责的银行家却从危机中脱离出来，没有受到明显损失。许多人对汹涌的难民潮感到担忧，认为当前的欧盟体系不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英国脱欧正是这种情绪的后果之一。

英国决定退出欧盟的影响之一是，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真正开始倾听民众声音。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总统使全世界感到意外。在欧洲，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具有相同的效果。保护主义和对自由主义传统的背离将主导未来几年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正如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家们正在回应他们的选民的需求。因此，人民的意愿正在推动欧盟进一步远离自由主义。

对于欧盟与亚洲的关系而言，欧盟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演变对经济关系有着明确的消极后果。欧盟将会继续追求自由贸易与双边投资协定，但与其谈判将更加艰难，因为欧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减少可能的损失。并且在必要时欧盟也会坚决退出谈判。亚洲国家如果想要获准进入世界最大的市场，将不得不同意比过去做出更多让步。从TPP协定的退出显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愿意推动自由贸易。亚洲国家也许不得不把与欧盟不太有利的协议，视为他们与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之间推进自由贸易的最佳选择。

不过，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亚洲国家可能会欢迎一个更不愿意对外干涉、更加尊重亚洲的欧盟。对于聚焦于恢复其威望的欧盟而言，规范性的价值观将不再是其重点。欧盟将不再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可供复制的模式，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和能够平等对话的合作伙伴。这可能会冒犯一些欧洲群体，他们相信欧盟对更加

分裂或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是光芒一样的存在。但改变后的欧盟会受到亚洲国家的欢迎，它们长期抱怨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无法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之处。

最后，英国选民离开欧盟的决定已经并将继续对欧盟与亚洲关系产生影响。考虑到脱欧决定背后的原因以及其反映出来的欧洲内外的情况，这种影响不可逆转。一个更少自由主义、更加偏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欧盟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将不得不习惯于此，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政策。一个更不自由的欧洲长远来看是否会彻底改变欧亚关系，这仍然有待观察。也许等到英国脱欧以及其他危机结束后，欧盟会重新拥抱自由主义。然而，此时欧盟试图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预期一些摩擦的产生。不过，由于欧盟对亚洲的政策的规范性色彩将减少，摩擦产生的同时，欧亚之间在政治与外交上将会实现更多合作。

由于欧盟对亚洲的政策的规范性色彩将减少，摩擦产生的同时，欧亚之间在政治与外交上将会实现更多合作。

(连晨超 译；李晨 校)